

·文献学苑·

## 《禹贡》成书时代考

岳红琴 (郑州大学殷商文法研究所 河南郑州 450052)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06)05-0142-07

《禹贡》成书时代问题是《禹贡》研究的基础和关键所在。关于《禹贡》的成书时代,近代以来一直是中国史学界的一个极富争议的话题。本文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自己学习古代文献和考古材料的点滴所得,就教于方家。

### 一 绪论

历史上关于《禹贡》的成书时代,说法颇多,纵观古今大致有夏代说、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及战国末期至汉代说等,其中近年来比较有影响的当为西周说和战国说。而战国说因顾颉刚先生首倡,且“以其学术声望及所举战国诸证中有数证具有说服力,因而信从者多,遂成为晚近学术界中有力的一说”。但以现有的材料看,学术界就此问题尚难达成一致意见,形成共识,即便在战国说的赞同者中,也还因成书的具体时代而存在不少分歧。

我们认为,在探讨《禹贡》成书时代之前,有一些基本的观点应当确立。第一,《禹贡》只不过是一种文学作品,其中的一些舛误在写作时代可能就已经存在,在千百年的传抄过程中,其中的舛误可能更多,现在有多种版本正好说明这个问题。对此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要对《禹贡》进行整体和全面的考虑。今天我们对它进行探讨和研究,是为了从中了解古代社会的情况,因此必须跳出释词和释地的圈子,从整体上对其进行把握。第二,对于《禹贡》要多重视其中的原始因素。《禹贡》全文虽仅千余字,但其所述内容却相当丰富,难怪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称其为“雄篇大作”。《禹贡》字里行间透露出不少古老的信息,因此,我们在确定其成书时代时,要充分重视这些内容。

### 二 冀州与周人尊夏

由周人尊夏的史实和《禹贡》中夏人始居地冀州的重

要地位判断,《禹贡》应为周人所作。

《禹贡》篇中,冀州与其他诸州相比,显得更加重要。《禹贡》以冀州为九州之首,条条贡道通冀州,而且冀州无贡品,其土壤列为第五等而赋为头二等,这是因为冀州是夏人最初的发源地(关于此,我们将以专文探讨),而周人是尊夏的,所以,由此判断《禹贡》主要内容成书于西周。

关于周人尊夏,李民先生曾有过专门的论述。他说,周之先民原居于今晋南地区,并与其它氏族(或部落)错处河、汾间,与夏族以及其它氏族结成了一个比较强大的部落联盟,即黄帝部落联盟。夏王朝建立后不久,出现“夏后氏政衰”,从属于夏政权的周族乘机向西迁徙,《国语·周语》韦昭注曰:“至不啻失官,去夏而迁”。后来周族以撮尔小邦,猝然夺取“大邦殷”的统治,在西方建立国家,迁都沔、镐,进而渡河灭商,统治了广大的中原地区。

周的先人和夏有密切的关系,周之始祖后稷,曾为夏的农官。《国语·周语》载祭公谋父对穆王说:“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弗务,我先王不啻用失其官……不敢怠业。”《逸周书·商誓解》曰:“昔在后稷,惟上帝之言,克播百谷,登禹之绪。”可见,周之先人曾是在夏时任职。《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了“季札观周乐”的故事,其文曰:“为之歌《秦》,(季札)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显然,在季札看来,周秦的音乐也是夏朝的。

周人常以夏之后人自居。《尚书》对此多有反映。周公东征后,以武庚殷余民封康叔,周公担心康叔年少,作《康诰》,追念周文王的功绩,以告诫康叔,其文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齔寡,庸庸、庸庸、庸庸、庸庸,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区”,《广雅·释詁》曰:“小也”。周人自称“区夏”,

也就是称自己为“小夏”。显然,这与《大诰》中周人所说的“小邦周”意义相同。周人以夏后人自居的例子,在《尚书》中还有,如:《君奭》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此“我有夏”显然是周人自指,故杨筠如《尚书核诂》曰:“此有夏即谓有周。”《立政》篇亦有言曰:“乃惟庶习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钦罚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万姓。”这里的“我有夏”显然也是周人的自称,亦即“我有周”之意。因周人时常以夏之后人自居,因此,周人又常以追循夏禹之功绩鼓励各王,如《尚书·立政》曰:“今文子文孙,孺子王矣。其勿误于庶狱,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再如《逸周书·商誓解》记载:“王曰:在昔后稷,惟上帝之言,克播百谷,登禹之绩,凡在天下之庶民,罔不维后稷之元谷用蒸享。”由此可见周人尊夏之一斑。当然,周人尊夏有其为维护统治,有意加强“宣传”攻势的政治目的,但也反映了夏、周族源关系的某些原始面貌。

正因为周人认为自己与夏是同源的,所以周人在写就《禹贡》时,就不免夹杂一些历史的、民族的感情因素在里边,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禹贡》九州以夏之发源地冀州为九州之首,各州贡道皆通冀州,且冀州无贡品等内容了。

### 三 梁州贡物中的“铁”

根据考古、文献资料和《禹贡》梁州贡“铁”的记载,我们认为《禹贡》的成书时代应在西周中期。

铁,《说文》曰:“黑金也。”铁的使用是一个民族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标志。恩格斯评价说:“它是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的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由于我国古代文献对何时开始用铁没有明确的记载,因此对于我国铁器时代始于何时,就成了学术界探讨的重要问题之一。但由于不同的学者所依据的材料的不同和对于铁器概念认识的差别,学术界对此问题尚未形成统一的看法。上世纪50年代,有学者曾指出,“在世界冶金史上,中国的钢铁冶煤油技术成就最早,而且极其出色。近几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已发现较早的铁器,是公元前五世纪的,但数量不多。同时又发现了公元前三、四世纪的铁器,不仅数量较多,而且已经有了相当的技术水平。从世界冶铁技术发展的历史来看,这种水平决不是初发明冶铁时就能达到的。因此可以推断中国冶铁技术的发明,可能是在西周时代,……到战国时代,冶铁技术就更有长足的发展。”我们认为此说甚确。本文进一步认为,我国人工冶铁始于西周晚期,而在此之前的西周中期,人们对于铁的性能和使用已经

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以此为基础,我们更进一步判断《禹贡》成文的时代应在西周中期。

人们对铁器的认识和使用经历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根据考古材料,早在殷商时期,人们已经对于铁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发现了一件铁刃青铜钺,这是目前发现的我国古代最早的铁制品。此钺残长11.1、刃宽6厘米。此钺的发现曾轰动了我国学术界。关于这件器物的刃部是否是人工炼制之铁,曾引起争论。经过运用多种现代测试手段分析鉴定,认定此钺的刃部系用陨铁制成。1977年在今北京市平谷区刘家河村也发现一件刃部由陨铁制成的铁刃铜钺。这两件铁刃铜钺的发现,证明至少在殷代人们已经知道用铁。铜钺本身为兵器,其以铁为刃,目的是为更有效地杀伤敌人。显然,“当时劳动人民从实践中对这种金属的性能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至少是已经初步认识以铁为刃比青铜更为锋利”。1931年,在河南浚县辛村卫国贵族墓中,也出土了用陨铁制成的铁刃铜钺和铁援铜戈,这是西周初年的遗存。

我国中原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人工冶铁遗物,是1990年在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1号高级贵族墓出土的铜柄铁剑,其年代为西周晚期(约公元前九世纪后半期)。经鉴定,此剑为块炼铁制品。从而表明,在西周晚期,我国工匠已掌握了块炼铁经锻打制造铁器的方法,也就是说到西周晚期,人们已经掌握了冶铁技术。

春秋时期的铁器迄今已在十余处遗址出土。这些铁器中,似以块炼铁经锻打而成的制品较多。可见至迟在西周晚期我国已出现的块炼铁技术,在春秋时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普及和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在春秋时期的铁器中出现了铸铁制品。如长沙识字岭出土的铁锛、长沙杨家山出土的铁鼎。战国时期,特别是战国中、晚期,铁器的种类和数量都比春秋时期显著增加,使用铁器的地域也显著扩大。这一时期,冶铁及铁器的制作技术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由考古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在西周早期及其以前,只有关于使用陨铁的实物发现,而人工冶铁的实物只在西周晚期及其以后才有。

文献中关于铁的记载不多,但仔细分析其内容,也基本能洞察同样的史实。《史记·周本纪》集解:《司马法》曰:“夏执玄钺。”宋均曰:“玄钺用铁,不磨砺。”这里“夏执玄钺”条中的“玄钺”,应当是铁刃铜钺,其铁刃应是一种陨铁制品。考古学上迄今尚未发现早于早商文化的铁刃铜钺。《逸周书·克殷》:“……乃右击之以轻吕,斫之以玄钺,县诸少白。”此“玄钺”,同《史记》中所记“玄钺”一样,应是指

陨铁制成的铁刃铜钺,不能以此来推断商代已能人工冶铁。《尚书·费誓》曰:“锻乃戈矛,砺乃锋刃。”《诗·大雅·公刘》曰:“取厉取锻。”这两处的“锻”,由文中的句式看,应为动词,是锻打之意。黄展岳先生也认为此锻乃是对青铜器的捶锻。青铜兵器或工具经过锻打是可以变得更为锋利,这应当是事实。因“锻”字而推测西周已有锻铁是不合适的。

文献中还有两处有关铁的记载非常值得注意。《诗·秦风·驺虞》曰:“驺虞孔阜。”《礼记·月令》曰:“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驾铁骊,载玄旂……。”在这两篇中,“铁”和“驺”字显然都指颜色而言。郭沫若曾指出,《诗·秦风》中,因马色如铁故名“驺”,也有把“驺”写作“鐵”字的。只有铁成为常见的事物以后,人们才会用它的颜色称呼别的东西。《诗·秦风·驺虞》是秦襄公时的诗,时人以铁的颜色来形容马匹,反映出秦襄公时人们对铁器已经相当熟悉,而秦襄公生活的时代正是西周末年和春秋初年。《诗经》的这一记载得到了考古发现的印证。1976年,陕西发掘的秦公一号大墓,出土了三件铁工具,据碳十四测定为875±150BC,属于西周晚期或春秋早期。1977年甘肃灵台的一座春秋早期墓葬中,也出土了一阵钢柄铁剑。再由《礼记·月令》中,以“铁”和“玄”为对照来形容不同的物品,说明人们已经对其所表示的不同的色泽有了清楚的认识。唐根际先生因此指出,《礼记·月令》篇中的“玄”字实际指的是陨铁的颜色,而“铁”字或“驺”字则指人工冶炼的金属铁的颜色。而要对铁的认识达到如此程度,必然是因为此时人们已经开始进行人工冶铁的缘故。换言之,《礼记·月令》和《诗·秦风》中的“驺”和“铁”字,可能是西周晚期已出现人工冶铁的反映。结合考古发现,也正好印证了这种说法。由此我们认为中国人冶铁技术应始于西周晚期,这与张宏明先生“中国铁器时代应起源于西周晚期”的观点不谋而合。而西周早期人们认识和使用的铁主要是陨铁。到西周中期以后,人们对铁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禹贡》梁州贡“铁”的记载,正反映了人们对铁的认识这一过程,既初步了解又不完全掌握,故而视其为稀贵之物进献于王室,由此我们判断,《禹贡》成文应在西周中期。

#### 四 对战国说的质疑

战国说目前虽说影响较大,但我们认为其非常值得商榷。

战国说最有力的代表人物是顾颉刚先生,他在《禹贡注释》中详论其观点时,提出了五个具体证据,对这五个论据,其弟子刘起舒先生的看法是“顾先生之说其(三)

(四)(五)是颠扑不破的,但其(一)(二)两证尚可商榷。”并对顾先生所提出的第一个论据内方外方二山战国才有和第二个论据《禹贡》载有菏水,因而必在吴王夫差开凿菏水之后两个论据的瑕疵进行了指证,我们认为刘先生所说非常有道理,同时我们也为刘先生不唯师、不盲从的学术求真精神甚感钦佩!

顾先生提出的第(五)条论据是中国之由铜器时代进入铁器时代,始于春秋而盛于战国,而梁州贡物中有铁和镞,故而说《禹贡》成书于战国时代。顾先生的这条论据我们在前已经讨论过,我们认为,以目前能见到的资料来看,中国人工冶铁应始于西周晚期,而西周早期所用铁皆为陨铁,处于二者之间的西周中期正是人们对铁的应用已有所了解而又不完全掌握的时期。《禹贡》梁州贡铁的记载正反映了西周中期人们对铁的认识的这一过程。

顾先生提出的五条论据,现在还有两条,这里我们想重点讨论一下第(四)条。顾先生认为至春秋时期蜀尚与中原隔绝,直到战国时秦于前316年灭蜀,“那里的情况才为外面所知道”,而后《禹贡》才得以以蜀境为梁州,也就是说,按照顾先生的说法,处于梁州境的蜀国的情况在秦灭蜀之前是不为外人所知的,而《禹贡》载有这方面的内容,因此《禹贡》制作时代必在秦灭蜀之后。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我们认为顾先生的这条论据很值得商榷。

蜀是中国古代四川西部一个最古老的政权。关于蜀人起源的传说,晋代常璩著《华阳国志》中记载:“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可见蜀人起源很早。

根据考古发掘资料,蜀人与中原地区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有过交往,并相互之间有一定的影响。位于大西南四川盆地中心区的广汉三星堆遗址,是我国迄今为止已发现的历史最早、规模最大的古蜀文化遗址。

三星堆遗址中发现的一些文化遗迹,与中原夏商文化有密切关系。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中曾出有3件兽面纹(饕餮纹)铜牌饰,是二里头文化中最重要最典型的铜器之一。三星堆遗址内外,也出土了数件与二里头铜牌相似的铜牌饰。李学勤先生说,“广汉一带的古文化与中原的二里头文化的联系,有不少线索可寻。嵌绿松石牌饰是一种非常特异的器物,竟在相隔遥远的两地出现,极其值得注意”。赵殿增先生综合这两地出土的铜牌饰,从器物形状、个体大小、穿纽位置形状数量、器身多有结物痕迹、铜饰上镶嵌绿松石的方式和技术、牌面上的图案内容等方面研究,认为两者是同



一种类型的器物。三星堆铜牌饰出现的时代,大约在二里头文化晚期到二里岗下层文化阶段,即相当于夏代晚期到商代前期。此外,三星堆与二里头出土的陶盂、高柄豆、玉璋、玉戈、玉圭等器物在形制上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两种文化之间的联系“有不少线索可寻”,因而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应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可以这么说,至少夏末以后,两地的人员曾有过交往,两地的文化曾有过交流。

关于夏与蜀的交往,文献记载很多,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黄帝之子昌意降居若水,娶蜀山氏之女,生高阳,是为帝颡,封其友庶于蜀的故事。如《史记·五帝本纪》曰:“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华阳国志·蜀志》载:“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颡,封其友庶于蜀”。《山海经》、《世本》、《纪年》、《帝王世纪》、《水经注》等也有类似记载。二是禹生川西石纽,禹娶涂山氏的故事。如《帝王世纪》云:“禹生石纽”。《华阳国志·蜀志》记:“禹生石纽,今之汶川都是也。”《华阳国志·巴志》云:“禹娶于涂山……今江州涂山是也。”三是夏启之臣孟涂“司讼于巴”,以及夏桀娶岷山二女、夏之遗氏被放于“南巢”的故事。如《竹书纪年》夏帝启八年云:“使孟涂如巴,莅讼。”《山海经·海内南经》云:“夏后启之臣孟涂司神于巴,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居巫山上,在丹山西”。《尚书·汤誓》云:“成汤放桀于南巢”。《括地志》云:“南巢在‘庐州巢县有巢湖。’”这些传说记载反映了蜀族和中原民族的关系甚为密切和古老。当然这些故事并不一定都确实可信,但也不能简单地一概加以否定。证之以地下考古资料,显然夏与蜀有历史关系的记载在某种程度是可信的。

到了商代,蜀与中原的交往进一步增多。据甲骨文记载,殷商时期,与蜀的关系时好时坏。双方关系融洽时,曾有使节往来,蜀人也曾向商进贡。卜辞曰:丁卯卜,共贞:至蜀,我又史?(《前》8·3·8)这是商王卜问是否有使臣到蜀。卜辞又曰:氏蜀射三百。(《铁》2·3·8)辞中“射”即射手。其意为蜀王以善射之射手三百人进献于商王朝。武丁时,商与蜀之间也曾有过战争。寅卜,贞:王共人,征蜀?(《后》2·27·7)“共人”是“登人”的省文,此辞意即为卜问商王能否征发人丁讨伐蜀。贞:吴弗其?羌、蜀?(《铁》105·3)显见是卜问是否讨伐羌、蜀。据周原甲骨反映,周人也曾伐蜀。“兹,伐蜀。”由于周人的征伐,蜀人降服于周,蜀于是成为周西土的“友邦冢君”,这或许是周为伐商所做的准备工作。武王伐纣时,蜀曾参与行动。《尚书·牧誓》记:“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考古材料也证明殷商时期,商、蜀交往频繁,相互应当有所了解。四川彭县竹瓦街1959年曾出土了一批窖藏青铜器。青铜容器的纹饰与中原地区商代晚期的青铜器纹饰大体相似。其中两件青铜斛的内底分别铸有“覃父癸”和“牧正父己”的铭文,其字体亦与商晚期铜器铭文相似。三星堆遗址中与商同期的遗物、遗存,也有很多中原文化的因素。如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戈、璋、琮、璧、环、瑗等玉石兵器和礼器中,绝大多数器物具有明显的商文化因素;出土的相当于二里岗上层至殷墟一期的青铜礼器中,尊、甗、盘和器盖等容器形制种类,都是商文化这一时期常见的形制种类,器物的纹饰也是商文化的纹饰风格。中原商文化中也有一些古蜀国文化的因子。中原地区仅在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式玉戈和式玉戈形制的玉器,在三星堆两个祭祀坑中却有大量发现,这显然是两种文化交流的结果。这种玉戈无疑是三星堆文化的特征性器物,殷墟妇好墓中见到的这种器物有可能是受到三星堆文化的影响。可见从夏代开始,蜀地已为外人所知,中原与蜀已有了往来与交流。由此再来看顾先生《禹贡》为秦灭蜀后作品的结论,就觉得颇有些匪夷所思。

如此,顾先生“战国说”的五条论据,现在看来,至少有四条值得进一步思考。

## 五 公盨与《禹贡》成书年代的确定

2002年,保利艺术博物馆展出了一件青铜器——公盨,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注意。盨是用来盛黍稷的礼器,由簋变化而来,西周中期偏晚的时候开始流行。公盨呈圆角的长方形,失盖,器口沿下饰长鸟纹,腹饰瓦纹,小耳上有兽首,原来应有垂环,圈足中间有桃形缺口。这种形制,在盨的演变序列中是较早的。李学勤先生认为:“其长鸟纹属于《殷周青铜容器上鸟纹的断代研究》所分的5式,特别类似于五年师盨,师盨正是西周中期后段的。盨的字体也有西周中期的特征。”经过进一步研究,李学勤先生确定这件盨属于西周中期后段,即周孝王、夷王前后。李零先生也认为,公盨的年代,“似定在西周中期偏晚比较合适”。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公盨的内底,有10行98个字的铭文,铭文开篇即曰:“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迺差地设征……”,这与《禹贡》开篇“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及《书序》:“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书序》用“任土作贡”概括《禹贡》的主要内容,公盨铭文也有类似的话,即“差地设征”。“征”,《左传》僖公

十五年注：“赋也。”“差地”是区别不同的土地，“设征”是规定各地的贡赋，一如《国语·齐语》所说的“相地而衰征”。

璽铭中还有“降民”之说，这显然与《禹贡》兖州条下所说的“降丘宅土”涵义相同，说的都是民众因洪水消退而得以从避水的丘陵上下来，重新开始居住于平地之上。

公璽的公示于众，特别是其铭文以禹平治水土为整篇铭文的引子，清楚地说明，至少在公璽的时代，《禹贡》已有一个基本的雏形，或者说有一个基本的底本，这也是本文之所以将《禹贡》的制作时代确定在西周中期的一个重要原因。李零先生也认为：“现在发现的公璽，年代属于西周中期，……而且语句与《禹贡》相似。这不仅对研究‘大禹’传说流行的年代很重要，也对研究《尚书》中《禹贡》等篇的年代很重要。至少是把《禹贡》式的传说，从战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现在，我们必须承认，这类说法在西周中期已经流行开来。”

不可否认，《禹贡》全文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不可避免地有西周以前历史的痕迹，甚至有夏代的史影，也可能掺入有西周以后的内容，如战国的东西，但我们判断其成书年代要以其主要内容为依据。综上，我们认为，以目前的考古和文献材料来看，将《禹贡》主要内容的成书时代确定在西周中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第一辑中，《书楼寻踪》的作者韦力先生是北京当代古籍善本藏书家。他的书，是其历经五年，探寻华夏历代藏书楼踪迹后撰写的当代“书楼寻访录”。书中所记江浙、湖南、广东、山东等地古代藏书楼或遗址达一百二十二处。

《书乡漫录》的作者是江苏常熟理工学院的曹培根教授，文献史专家。他通过“虞山书人”、“藏书盈邑”、“琴川书事”以及“学人书品”四章为常熟的藏书历史明晰条理，同时还论及了江南的书人书事。

《书目与书评》的作者孟昭晋先生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目录学专家。他的书，是对古代、近代书目书人的阐幽发微，书中既介绍了曹丕、晁公武、刘向、曾国藩、康有为、王重民、刘国钧等历代在目录学上有所建树者，也评论了瞿秋白、茅盾、季羨林、钱钟书、萧乾等现代名家的书评特点。

《二徐斋说书》的作者刘尚恒先生是天津图书馆研究员、古籍版本专家，他的书，通过“书话”、“书人”、“书事”以及“书品”四编，对古今稀见好书、前人著述补正考订、藏书文化、室名斋号、书坊书贾、等内容多有详细的论述。

《蓝村读书录》的作者谢灼华是武汉大学教授、图书馆学史专家，他的《蓝村读书录》，由书话谈到书的命运，又由

谈藏书楼伸展到近代的图书馆，叙述了中国图书发展的源流，以及一些书业前辈淘书、藏书、读书的轶事。

第二辑中，《邃谷书缘》的作者来新夏先生是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学者，原南开大学图书馆馆长。……

《苍茫书城》的作者徐雁先生是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知名书评家，他的书是岳麓书社版《沧桑书城》的续编。分为“书城内外篇”、“书与人杂志”、“书刊源流记”三辑，汇集旧作新文24篇。除了《“五车楼”安在》、《“书铺”说》等文，继续对中国私家藏书楼存亡以及典籍的聚散做出思考外，还论及古旧书铺、风雅文化、耕读文化、淘书读书等话题，叙说克乃文、王重民、程千帆等人物，追溯《古文观止》、《书目答问》等经典书刊的学术源流，另有《徐雁序跋 自序》等三篇一组自述作者学术历程的前言后序。

《夜趣斋读书录》的作者林公武先生是福州市文联副主席，福州市书画研究院院长，《书林清话文库》第一辑前勒口和封底的丛书名印章，就是其篆刻作品。作者阅读出入文史书林，其题跋或则密密麻麻地题记于上万册书页之上，或则并不成章地随手写在读书日记里。编为本集时，按照多门类、多题材、多体裁地选择三十年间近30万字，并依照读书年月先后为序排列，以见“读书之轨迹”。

此外，《旧书业的郁闷》的编者是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硕士研究生叶安然同学，她随晓雨老师一起辛勤选编半年多，共汇集数十篇有关中国旧书业兴衰的随笔散文，可读性和史料性都很强。

还有《笑我贩书续编》的编者范笑我先生是浙江嘉兴秀州书局的经理，他的《笑我贩书》（嘉兴秀州书局书业杂志笔记选）在江苏文艺出版社问世后，曾经受到图书发行业内的广泛关注，本书是其续编。

问：我注意到上述介绍只提到十种书。你是特意留下了北京中国书店和上海图书公司两位业内人士的著述，想给予特别的介绍吗？

答：是的。这两部书是当今我国南、北方两位古旧书业专家问世的第一本书，所以应予“隆重推出”。他们都是本书主编之一、《中国旧书业百年》（科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的著作者徐雁先生在研究中国旧书业的过程中发现的作者。

周岩先生是原北京中国书店的老经理，我国研究古旧书业的专家。他的《我与中国书店》，以中国书店为中心，记述了当代北京古旧书业的“书林纵横”和“书友志林”，是研究北京古旧书业提供一份翔实的资料。

《旧书鬼闲话》的作者虎闹（陈克希）先生是上海图书

公司的业内资深人士、旧书刊研究专家……

问:听说河北教育出版社已经在今年五月同两位主编傅璇琮、徐雁先生约定,要在今年秋上马第三辑。那么第三辑书的进度如何,是否可以向我们的书友透露一二呢?

答:好的。《书林清话文库》第三辑的计划是这样的:拟议中的六种书,主题将向近现代图书文化领域延伸,除刻书、藏书、古旧书业等传统内容外,可能选入毛边书话、现代书话之话等题材,作者分布在合肥、苏州、杭州、南京等地。计划于9月底陆续交稿,明年元月问世。

参考文献:

- [1] 刘起釭:《禹贡的写成年代与九州来源诸问题探研》,《九州》(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7页。
- [2] [日] 内滕虎次郎:《禹贡制作时代考》,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商务印书馆1931年。辛树帜《禹贡新解》附录收有,见第64—69页,农业出版社1964年。
- [3] 李民:《释尚书“周人尊夏”说》,《尚书与古史研究》,中州书画社1981年;《再论夏、周族之关系》,《夏商史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
- [4] 李民:《再论夏、周族之关系》,《夏商史探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1页。
- [5]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59页。
- [6] 周世德:《我国冶炼钢铁的历史》,《人民日报》1958年2月22日。
- [7] 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河北藁城台西村的商代遗址》,《考古》1973年5期。
- [8]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67页。
- [9] 李众:《关于藁城铜钺铁刃的分析》,《考古学报》1976年2期。
- [10]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平谷县发现商代墓葬》,《文物》1977年11期。
- [11] 河北省博物馆、河北省文管处台西发掘小组:《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遗址1973年的重要发现》,《文物》1974年8期。
- [12] R.J. Gettens, Two Early Chinese Bronze Weapons With Meteoritic Iron Blades. Bruder Hartman, Berlin, 1971. 转引自王巍:《中国古代铁器及冶铁术对朝鲜半岛的传播》,《考古学报》1997年3期。
- [13]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三门峡市文物工作队:《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 M2001 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2年5期。
- [14]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66页。
- [15] 长沙铁路车站建设工程文物发掘队:《长沙新发现春秋晚期的钢剑和铁器》,《文物》1978年10期。
- [16] 黄展岳:《关于中国开始冶铁和使用铁器的问题》,《文物》1976年8期。
- [17] 郭沫若:《中国史稿》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6年,313页。
- [18] 韩钊:《春秋时期的秦国社会经济》,《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1期。
- [19] 林剑鸣:《秦人早期历史探索》,《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1期。
- [20] 吴慧:《西周奴隶制及其向封建制的演变》,《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1期。
- [21]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81年。
- [22] 唐根际:《中国冶铁术的起源起源问题》,《考古》,1993年6期。
- [23] 唐根际:《中国冶铁术的起源起源问题》,《考古》,1993年6期。
- [24] 张宏明:《中国铁器时代应起源于西周晚期》,《安徽史学》1989年2期。
- [25] 刘起釭:《禹贡的写成年代与九州来源诸问题探研》,《九州》(第三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7页。
- [26] 顾颉刚:《禹贡注释》,《中国历史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4页。
- [2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1981年河南偃师二里头墓葬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1期;《1984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几座墓葬》,《考古》1986年4期。《中国青铜器全集·夏商(一)》图二二,文物出版社1996年。
- [28]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工作站、广汉市文物管理所:《三星堆遗址真武仓包包祭祀坑调查简报》,《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
- [29] 李学勤:《从一件新材料看广汉铜牌饰》,《中国文物报》1997年11月3日。
- [30] 赵殿增:《三星堆与二里头铜牌饰研究》,《殷商文明暨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 [31] 李学勤:《从一件新材料看广汉铜牌饰》,《中国文物



报》1997年11月3日。

- [32] 杜金鹏：《三星堆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及其相关问题》《四川文物》1995年1期。
- [33] 林向：《蜀与夏——从考古新发现看蜀与夏的关系》，《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4期。
- [34] 1976年发现的周原先周卜辞编号68卜甲。
- [35] 王家祐：《记四川彭县竹瓦街出土的铜器》，《文物》1961年11期。
- [36] 陈德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2期。
- [37] 陈德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中华文化论坛》1998年2期。

[38] 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82页。

[39] 李学勤：《论 公盨及其重要意义》，《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6期。

[40] 李学勤：《 公盨与大禹治水传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1月23日。

[41] 李零：《论 公盨发现的意义》，《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6期。

[40] 李零：《论 公盨发现的意义》，《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6期。

作者简介：岳红琴（1971-），女，汉族，河南温县人，郑州大学殷商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史。

（上接第131页）季振宜（1630-？）《季沧苇藏书目》、钱曾（1629-1699之后）《也是园书目》、黄虞稷（1629-1691）《千顷堂书目》、徐乾学（1631-1694）《传是楼书目》。<sup>[20]</sup>这些书目中都至少包括一种由耶稣会士撰写的著作（总约138种）这个数字正是当时出版流传的有关西学文献的大部，表明西学著作在明清之际不仅受到了学界的重视而且也得到了广泛的流传。

晚明相对自由开放的学术空气和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以及注重可用之学的科学思潮，加上明中晚期刻书、藏书事业的发展，给远道而来的耶稣会士传播西学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会和良好的文化氛围，有利于西学文献的传播，使带有全新气息的西方异质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终于风云际会，第一次出现了中西文化交流中宗教、哲学、思想、科学技术层面上深层接触的历史时期，成就了中西文化交流长河中的一段佳话。

参考文献：

- [1][11]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25-26。
- [2] 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Z]，台湾：光启社、辅仁大学出版社，1986：34。
- [3] 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5：451。
- [4]（清）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5：132-134。
- [5][19] 王国强：《明代目录学研究》[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25，48-49。
- [6] 裴化行、管震湖译：《利玛窦评论》[M]，北京：中华书局，

1985：203。

[7] 沈定平：《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577-578。

[8]（明）徐光启：《同文算指》序[A]，王重民辑校：《徐光启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3：81。

[9] 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3：431。

[10][12]（明）徐光启：《徐光启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3：23，45。

[13]（清）黄宗羲：《明儒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十。

[14] 萧蓬父、许苏民：《明清启蒙学术流变》[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216。

[15] 徐宗泽：《明清间在华耶稣会士译著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89。

[16] 陈垣：《重刊灵言蠡勺序》[A]，陈垣学术论文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0：237。

[17]（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北京：中华书局，1958：卷四。

[18]（清）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M]，清道光七年常熟张氏刻本。

[20] 钟鸣旦、杜鼎克、肖扬译：《简论明末清初耶稣会士著作在中国的流传》[J]，史林，1999（2）：30-35。

作者简介：邹桂香（1978-），女，河南泌阳人，新乡医学院管理学院讲师，郑州大学信息管理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图书馆学与文献学；李姝娟（1979-），女，河南新乡人，新乡医学院图书馆馆员。